

胡适研究论丛第三辑

耿云志 宋广波 / 主编

心長路遠

胡适研究的历程



心長路遠

胡适研究的历程

胡适研究论丛第三辑

耿云志 宋广波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研究论丛. 第3辑, 心长路远: 胡适研究的历程 / 耿云志,
宋广波 主编.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5316-7790-1

I. ①胡… II. ①耿… ②宋… III. ①胡适(1891~1962)—人物研究—文集
IV. ①K825. 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6928号

胡适研究论丛 第三辑

心长路远: 胡适研究的历程

HUSHI YANJIU LUNCONG DISANJI

XINCHANG LUYUAN: HUSHI YANJIU DE LICHENG

作 者	耿云志 宋广波 主编
责任编辑	宋舒白
装帧设计	冯军辉
责任校对	吕 红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E-mai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700 × 1000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330千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7790-1
定 价	48.00元

编者的话

胡适在中国近代史上真可算是大起大落的人物。民国时期，因为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建树，被公认为教育、思想、学术界的领袖。虽然不时有攻击和反对他的言论，但都未能动摇他的地位。1949年以后，特别是经历1954—1955年在全国展开的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以后，胡适几乎成了一切反动罪名的箭垛人物，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直到“文革”行将收场，他才作为历史人物，渐渐进入学者的视界之内。经历十几年的时间，到上世纪90年代，胡适研究俨然成了一门“显学”。大概可以确定，最近二三十年来，在中国近代人物中，没有哪一个人像胡适这样，引起这么多人的持久关注，出现这样多的研究他的著作。胡适重又“显赫”了。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极可注意的一件事，值得人们认真加以思考。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回顾这一历史进程的书。本书只涉及中国大陆学者研究胡适的情况，因为上述的学术现象也只是发生在大陆范围内。

胡适研究走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历程。这期间学者们所做的工作，绝大部分都属于所谓历史还原的工作，即揭示胡适确有哪些思想，哪些主张，这些思想和主张的确切意义是什么，它们当时产生何种影响等等。有人或许不看重这些工作，喜欢大议论。须知，议论如果没有足够的事实支撑，那只不过是一些无足轻重的空话；议论要有分量，必须建立在不可动摇的事实的基础之上。

本书包含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参与胡适研究的学者们写的回忆。我们曾邀请很多学者写这种回忆。有些朋友或因年高不胜笔耕之劳，或因工作繁忙以及其他原因，未能如约写出他们的回忆，略感缺憾。现有的十篇回忆文章，亦略可反映胡适研究历程的一些侧面。因为各人参与胡适研究的情况不尽相同，所以，各人的想法与关注点也有所不同。回忆的文章，难免有记忆不准确之处。这是需要向读者说明的。

第二部分，是胡适研究编年纪事。这是记述胡适研究历程的重要部分。由于过去没有专门注意搜集保存相关资料，有些资料一时难以搜集完全。所以这个编年纪事，还难以做到全面、系统，我们力求大事不遗漏。

第三部分，是胡适研究论著目录（附胡适资料书录）。这一部分是在过去断续搜集、整理的资料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订而成的。有些散见于各地方报刊上的文章，未能完全收入。但这个目录，是至今最详尽、最有参考价值的目录资料。

此书受人力、物力以及时间的限制，尽管编者做了很大的努力，花费许多劳动，仍难免存在缺欠。希望读者，特别是参与胡适研究的学者朋友提出意见和补充材料，以备再版时加以修订。

编者 2015年2月26日

目录

编者的话·····	1
-----------	---

学者回忆

心长路远，努力前行——回忆胡适研究的历程·····	耿云志	2
始于怀疑 终存疑虑——回眸我的胡适研究之旅·····	易竹贤	30
点滴的回顾与思考·····	朱文华	54
我的胡适研究之路·····	欧阳哲生	67
从胡适到“五四”·····	张德旺	76
走近胡适三十年·····	方利山	84
“泥上偶然留指爪”——我与胡适研究·····	陈漱渝	93
我的胡适阅读历程·····	何卓恩	98
胡适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谢泳	107
我与胡适资料收集研究·····	胡成业	112
先父与胡适研究·····	颜军	119

胡适研究编年纪事（1979—2013）

胡适研究编年纪事（1979—2013）

…………… 宋广波 吴云峰 董立功 张书克 李建军 编 132

胡适研究著述目录（1979—2013）

胡适研究著述目录（1979—2013） …………… 宋广波 辑录 240

胡适研究论文、文章目录（1979—2013） …………… 宋广波 辑录 250

重要胡适资料书录（1979—2013） …………… 宋广波 辑录 450

学者回忆

心长路远，努力前行

——回忆胡适研究的历程

耿云志

我之从事胡适研究，是许多原因促成的。

1972年，“文革”尚未结束，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尚未成立）接到任务，要组织人力进行中华民国史研究。据说这是一年前，在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等人提出的建议。我1964年毕业后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先后搞两次“四清”，一次农村劳动，接着，就进入“文革”。所以还从未接触业务工作。搞民国史，让我们一部分年轻人有机会比其他人提前进入业务工作，是很大的幸运。然而，“文革”毕竟尚未结束，我们也就不可能完全正常地全力做研究工作，大约每星期可以有三四天的时间用来做研究工作，其余的两三天时间免不了要参加“文革”各种活动、各种会议之类。这已经令人羡慕不已了。

由李新先生领衔，于1972年10月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实际上当时叫作研究组），起初只有十几个人。李新先生要求大家先从搜集整理资料入手，分作三个小组，一个小组以民国人物为中心，一个小组以大事记为中心，另一个小组以专题资料为中心。

我们的工作得到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双方约定，由我们民

国史研究室的三个小组分别编写《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人物传”、“大事记”和“专题资料”三个系列的稿子，交给中华书局刊印，作为内部资料发行，借以征求意见，为将来撰写《中华民国史》做准备。

我被分在“人物传”小组。第一步工作是查阅资料，列出千人左右的人物传入选名单。我主要关注思想文化（包括教育、科技、艺术等）方面的人物。很显然，胡适是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首要人物，对他是一定要作为重点加以研究的。可以说，我是被一种客观形势推到研究胡适的路上来的。如果没有研究中华民国史这回事，按我个人的兴趣，我可能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晚清史的研究。又如果我不是被分在中华民国史的人物传小组，又如果我不是被委以重点关注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我也许就不会和胡适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当然，这只是客观形势的一面，单有这一方面，还不足以使我同胡适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因为我可以一般地了解胡适的主要资料，写一篇胡适小传，就可以交差了，不一定要没完没了地研究他这个人。

这就要谈到我的个性与兴趣。我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从读高中的时候起，就对思想和理论产生兴趣，尤其是读了我的朋友送给我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随后又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我觉得我的兴趣完全转到自我思想训练上来。这使我在高中毕业鉴定中，被戴上“有严重自由主义倾向”的帽子。为此，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在大学的中国哲学史一课，胡适只是被简单地批判一通，他到底有些什么思想主张，并不清楚。现在有机会研究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我应该把胡适的思想弄个清楚。

这时，已是文革高潮过后，对于我这个爱思考的人来说，已不可遏止地开始反思，不但反思“文革”本身，还必然地要反思到一切引发“文革”的各种思想萌蘖的过程。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们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有数量非常可观

的胡适档案资料，可以为我的研究提供很大的方便。

我深知，研究胡适这样一个曾被一场席卷全国思想文化界的大批判运动彻底否定的人物，是有很大困难的，特别是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我只能从搜集资料入手，先做一点资料积累的工作。1975年，我一头扎进胡适档案中，大约陆续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把胡适档案查阅一遍。同时，我试探性地写一篇丁文江的小传。因为丁与胡适关系非常密切，其思想观点亦极相近。对丁文江的评述，可以为胡适的评述得些参考借鉴。我访问了跟丁文江关系较多的黄汲清先生、高振西先生等，还把初稿交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张文佑先生带到他们研究所去征求意见。张文佑所长告诉我，一位曾与丁文江很接近的尹赞勋先生说：“怎么能给丁文江立传呢？”这很可能反映出那时一班人的思想状态。不过我还是把我的《丁文江》的稿子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的第四辑（1977年10月）上发表出来。我知道，丁文江与胡适不同，胡适经过全国规模的大批判，人人知道他是思想文化界第一号的“反动派”，而丁文江只有知识界较少的人知道他的一些情况。所以，对胡适能写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发表出来，还需要仔细斟酌。

《胡适》小传的初稿紧接着《丁文江》写出，但《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的第五辑是1978年10月才出来。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胡适》小传中除了对其文学革命的贡献有明确的肯定以外，还远远没有做到客观、公正。这不仅是环境使然，我自己的认识也还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二

大约就在《胡适》小传出来不久，李新先生对我说，明年（1979）是五四运动60周年，准备举行一次高规格的学术讨论会，你可以就胡适

写一篇文章。我当时只是漫应着，总觉得写一篇学术论文，若不能较充分地表述自己的见解，似乎没有什么意义。那时，我正在为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有关章节到处搜集材料，故宫明清档案馆（即后来的国家第一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处查过以后，我到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借住一个多月，查阅那里的报刊资料。有一次，我从北大回来的路上，听见广播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印象最深的是说，中共的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心放在建设事业上，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片面突出政治，大搞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那么喜欢给人扣政治帽子。如此，就可以比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述。因此，我觉得胡适的文章可以写了。

大约是1979年春节过后，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交给李新先生审阅，他觉得很好，就直接转交给主编《历史研究》的黎澍先生。当时，黎澍先生还兼任近代史研究所的副所长。有一次，他在研究所后面的大院子里，在我们研究室的门前遇见我（那时，近代史研究所仍是三进四合院的旧貌），主动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放，他认为，我那篇文章是即将发行的一期《历史研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

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于5月2日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举行，新一期《历史研究》刚刚出版，与会的每一位学者都见到了这本杂志。记得，讨论会上收到五六篇以胡适为主题的文章。会后，我参与编辑讨论会的论文集，有关胡适的文章入选的比例是最高的。我发现，会议竟然没有一篇关于蔡元培的文章，觉得很不合宜。我同主持编辑工作的丁守和先生商量，我抽出一个星期的时间赶写一篇蔡元培的文章，加入论文集里。

这一次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活动带有标志性意义，从此对新文化运

动有了新的研究视野，对胡适进行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从此开始。

胡适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是开启一代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他是整个民国时期，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入的知识界领袖，在教育、学术、文化乃至政治等诸多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他的认识有重大变化，势必引发诸多方面的重新评估。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将是一个需要做出长期努力的课题，也将是一个会遇到各种阻力和经历诸多曲折的过程。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我和黎澍先生商量，要重印《胡适文存》。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积极承担出版的责任。于是，我开始对《胡适文存》一、二、三集做校订工作，当第二集的校订快要完成，而第一集的校样已经排出的时候，突然听说有某位高层大员发话：“我们社会主义的出版社，怎么能出版胡适的东西呢？”出版社的负责人立即决定撤项，于是重新出版《胡适文存》的打算无法实现了。大概一直到90年代初，才有胡适原著陆续重新出版。而到新世纪，连《胡适全集》也出版了，而那位企图阻止这一进程的大人物却早已作古了。

我的第一篇研究胡适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后，经常有杂志和出版社向我约稿，都无法应允。原因是，我从1981年开始协助黎澍先生工作，我自己也还需要完成研究所和研究室一些集体项目的工作。况且，家务负担也非常之重。我没有精力再做其他。胡适研究，始终是我个人的一项业余的工作。

1983年秋冬，有一场所谓“清理精神污染”的运动。我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上所发表的有关清末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研究的文章，当时影响都比较大，这时都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有涉“精神污染”的作品。所以，所内为“清理精神污染”而设立的审查小组把我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起初，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小组，慢慢稍有耳闻。不过我当时认定：第一，“文革”刚过去不久，人们痛定思痛，像过去那样再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整人运动”几无可能。

第二，我关于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立论都是有根据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站住脚的。大约到了1984年的春天，参加那个审查小组的钱宏先生和何重仁先生找我谈话。钱先生给我的印象一向很好，为人比较正派、平和，何重仁先生过去倒是每场运动都颇为积极。我记得钱先生一言未发，主要是何先生讲。他说：“我们按领导要求，仔细看了你的文章，认为还是属于学术见解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审查结论。当时我正在一边帮助黎澍先生做事，一边为四川出版社赶写一部书稿。原来，四川人民出版社派人来找我商谈，要我写一本关于胡适的书。我说，写胡适的传记，条件尚不成熟；我可以赶写几篇专题论文加上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再附上一个胡适的年谱简编，凑成一本书。他们同意了。此事，李新先生和黎澍先生也表示支持。于是我可以稍稍利用正常工作的时间做这项工作。大约将近一年的时间，书稿成。这本书稿共收论文九篇，其中有三篇是在《历史研究》上面已经发表过的，另有六篇是这一年里赶写出来的，还有一篇关于胡适博士学位问题的考证文章，是早几年写出而未曾发表的，作为附录收入书中。胡适年谱简编，也是早几年写有初稿，在这一年里补充材料。1949年前的部分主要材料来源是胡适档案。1949年以后的材料主要来源是胡颂平编的《胡适年谱简编》（那时，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在大陆还见不到）和部分台湾出版的期刊。全部书稿约40万字，于1984年7月交稿。10月，我亲到成都看过校样。1985年《胡适研究论稿》问世。这本书是1949年以来，大陆上第一本研究胡适的书，而且因是专题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尽管今天看来，在认识和评论上还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但在当时的海内外学界人士看来，已属思想相当开放的书了。而且书中用了大量胡适档案中的材料，所以广受重视。记得当时香港、美国的多种中文报刊都有报导和评论，还收到不少海内外来信，赞赏此书的价值，也有的提出具体的意见。

1986年，又发生一场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现在绝大多数人都知道，那是因何而起的运动。运动既然发动了，总会有人紧紧跟随。于是有几家报刊上便又有批判文章发表，其中有一篇因作者地位很高，所以文章分量也显得很重，是在《光明日报》上发的，其中不点名地批评黎澍先生和我。文中说到学校的课堂里不允许讲唯心主义的东西。这个说法引起一些老辈学者的抗议。他们指出，除非在全部教育中完全排除历史的内容，否则是无法做到完全不讲唯心主义的东西的。此话有人反映到主管意识形态的人那里，于是学术界的批判运动不了了之。

也就在这一年，统战部知识分子工作处的负责人陶斯亮女士来找我，说是安徽绩溪县要求将胡适故居作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此文件被转到统战部，要求他们研究，并向中央提供处理意见。陶斯亮希望更多了解有关胡适的情况。我们就在我的办公室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她虽是学医的，但文史方面的书读过不少，所以很容易沟通。谈过之后，她提议，邀请我到统战部去跟他们的干部一起谈一下。这个办法果然很有效果。我略微系统地谈了胡适的情况之后，他们的负责人又要求我代他们起草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我慨然应允。我不知道他们在我起草的报告上面做过哪些修改，后来陶斯亮告诉我中央批示的主要意思，说，对胡适暂不作全面评价为宜。胡适故居只作为地方的文物保护单位，直到新世纪，才把胡适故居所在的上庄村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

自从《胡适研究论稿》出版以后，有更多的出版社要求我写胡适的传记。我仍然没有答应，我仍觉得条件不够成熟，写不出自己可以满意的胡适传记。我只答应四川出版社，把原来《论稿》中的年谱简编进一步充实，单行出版（原来，香港中华书局抢先把那个年谱简编单行出版

了，据说，销路还不错）。新编的《胡适年谱》于1989年出版，此书对于胡适研究者和其他对近代思想学术史感兴趣的人，颇有参考价值，被引用得更多些。

1989年的风波过后，学界气氛颇为滞重。但1991年是胡适100周年诞辰，我觉得应当做点什么，否则既对不起前人，也对不起后人。

1990年，有一次在院里出席一个会议。中间休息时，我同胡绳院长说，明年是胡适先生100周年诞辰。现在尽管对胡适评价还有很大分歧，但胡适对中国新文化的影响是举世公认的。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当年也不会搞那样大规模的批判运动。现在知识界已有相当多的人开始对胡适有新的认识。我估计，为胡适诞辰百周年，海外一定有纪念活动，我们如果毫无举动，是很不合宜的。我打算明年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以为纪念。您看是否可行？胡绳院长说：“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随后他又说，“过几天我要召集历史学片各研究所所长会议，你来列席参加，把你的想法在会上说一说。”我很高兴，答应一定参加，这说明我的想法已经开始进入逐步实施的程序。我在历史学片各所所长会议上，稍详细地说明我的想法，以及关于举办胡适研讨会的初步设想，结果获得所有参会者的热烈赞同。于是，胡绳先生便对我和近代史所的所长王庆成先生说，要我们就此事用近代史所的名义向院里打报告。这报告自然由我来起草。不久，院领导即批示同意，并拨一部分经费支持。大约从1990年底到1991年春，我花了很多精力来筹备第一次全国规模的胡适研讨会。

第一是联系各地对胡适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希望他们都能借此机会相聚在一起，互相切磋、交流。有些人从1979年以来已陆续认识，有些散在各地的学者需要设法联系。第二是选择会议地点。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希望在胡适的出生地举办第一次研讨会，这样比较有意义。以后再举办会议，也都选择胡适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至少是他足迹所到的地方来

举行。我和近代史所的科研处长一起专程到安徽去考察，先后在合肥、绩溪、黄山等处停留。绩溪应是首选，但那里举办学术会议的条件确实不是很好。但当我听到绩溪县机关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说：“耿先生，胡适研讨会如果在首都北京举行，我们没有话说；但如果其他地方，而不在绩溪举行，我们想不通。”这句话令我十分感动。一个普通的绩溪人，对他们的先贤有如此的情怀，这在当时，胡适在学界以外还远没有得到起码的正名的时候，是非常难得的。这与他们的领导层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做领导的，总难免有种种顾虑。我决定即在绩溪举办第一次胡适研讨会，以纪念他一百周年诞辰。我相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会议是无论如何总可以开得好的。

原来准备在1991年的暑假期内举办这次研讨会，以便于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学者参会。但很不巧，当年夏天绩溪发生少有的大洪水，不得不改期在11月举行。我在10月上旬，将所有会前筹备工作都安排妥当。10月14日，我离京赴武汉参加辛亥革命80周年研讨会。会后赶往广州，从那里出发去香港参加中文大学举办的胡适研讨会。在那里，初结识陈方正先生、金耀基先生、刘述先先生、许倬云先生等，会后拜访香港大学历史系主任吕元聪教授和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吴伦霓霞教授。几年前，吴教授曾邀请我访问中文大学，因故未去，此番也算是践履前约。我为香港之会提供的论文是《胡适的文化心态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此文收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一书）。

此次在港停留一周，回程在广州停留一日，于11月2日从广州直飞黄山，有汽车送我到绩溪。绩溪县委书记提出两条：他们县政府不宜做合办单位，可改称协办单位；他本人不宜担任组织委员会的副主任。我知道他的意思，答应可以商量。

我为了会议能够顺利举行，拜访了绩溪几大班子的多位负责人。由